

今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前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由国务院新闻办正式发布。

这份全面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文献,嵌入了六个“专栏”以注其要。其中“专栏2”就以《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题,追述了70余年前民主人士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历史。

今又九月,整整72年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召开,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

本栏目今起分上、下两篇,回顾这段串联起香港与内地,发生在繁华都市与茫茫大海之间,冲破波诡云谲、奔向光明的历程,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文/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图/资料图片

1946年,在全面内战和独裁统治的阴云下,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管制。为了保存民主革命的力量,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众多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避开特务的盯梢,秘密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和平民主运动与进步文化活动。这其中包括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翦伯赞、邓初民、茅盾等一大批知名人士。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政治活动家、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形成了浩浩荡荡的爱国民主力量。

各个民主党派不但在香港积极开展活动,而且根据各自代表的阶层利益,在组织上做了新的调整。例如: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

解散之后,其中央常委沈钧儒一到香港,便重建了民盟的领导机构。国民党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有革新国民党的愿望,李济深从上海到了香港之后,也经常与蔡廷锴、谭平山等志同道合者商讨开展反蒋民主运动的工作。在中共香港分局推动下,他们在1948年1月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以李济深为主席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又如:黄炎培委派孙起孟在香港重建了民主建国会;马叙伦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这时也转移到香港;陈其尤在香港正式恢复了中国致公党活动,等等。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这一系列行动,不仅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而且朝与中共长期合作的统一战线政党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对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并开列拟邀请的解放区以外民主人士29人,其中留港的就有16人!

在那个交通、通信皆阻隔的年代,竟然仅四天之后的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即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致公党)陈其尤,农工党彭泽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谭平山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就迅速集结起来,联合致电毛泽东,公开响应“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允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各界暨海外同胞与中国共产党“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全国同胞书中说:“通过新政协会议以解决国是,既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径,本盟愿号召全国人民,吁请各民主党派友民主团体,共同为迅速实现新政协而努力”;

6月25日,民革发表的宣言中说: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为消灭卖国独裁的反动统治和建立独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所应循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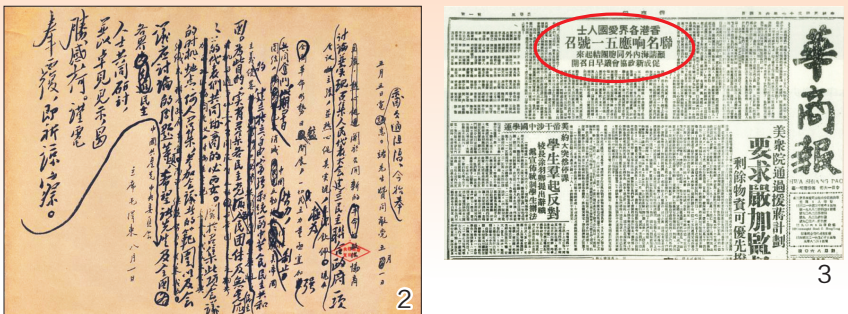
在一份集结人数最多的《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五一口号”》中,包括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邓初民、陈其瑗等在内的125人联署道:“倘使过去的政协是人民代表向反动当局要索一些民主权利,那么将来的政协,是人民的政党用民主的方式,和全国所有民主势力的代表们平等商谈国家大事。”从而将当前鼓舞民志、协商建立新中国的“新政协”,与1946年国民党主导下召开、名存实亡的“旧政协”区分开来。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发布,引出70余年前肇始于香港的一场“新政协运动”

五一口号 一呼百应 多党合作 同心建国



1. 香港民主人士关注内地局势,保持密切联系。图为1948年民主人士在蔡廷锴寓所前的合影。左起:郭沫若、谭平山、蔡廷锴、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



2.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对12位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复电文稿

当时,还有两个层次的“双周座谈会”:像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吴茂荪(代表冯玉祥)等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在位于天后庙的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机关举行,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和潘汉年、香港工委书记兼统战委书记连贯都出席;另外,就是在湾仔某单位会议室举行的、中层民主人士参加的座谈会。

每次集会,都洋溢着民主人士对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民主联合政府即将诞生的兴奋情绪,同时也带着对召开新政协的高度责任感。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会议记录,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最为详实:会上讨论了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范围等诸多具体细节。与会者非常踊跃,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郭沫若、茅盾等先生都作了多次发言,李济深则因当日有事请假,委托连贯传达他的意见。对有些问题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李济深主张等到解放军拿下平、津之后,才在北平召开新政协;李章达、谭平山则不同意。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会议记录,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最为详实:会上讨论了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范围等诸多具体细节。与会者非常踊跃,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郭沫若、茅盾等先生都作了多次发言,李济深则因当日有事请假,委托连贯传达他的意见。对有些问题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李济深主张等到解放军拿下平、津之后,才在北平召开新政协;李章达、谭平山则不同意。

不要不要在东北开会”,“未正式召开前要有准备的机构”。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先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正式会议也于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

此外,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新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国家职权的方案,也是在经过各方民主协商之后做出的。

副主席中,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都是自香港归来的。

如果没有这11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成功到达北平,人民政协会议就不可能在1949年9月顺利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不可能在10月1日诞生。各民主党派从响应“五一口号”的倡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热烈开展“新政协运动”,到秘密离开香港,辗转抵达北平,直至一同筹备和召开政协会议的整个过程,堪称为了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一道,成为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典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阐明,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他们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回望这一段从香港到北平的壮阔历史,诚哉斯言。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联合主办

羊城晚报社

访谈

莫岳云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专员,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载入史册的“新政协运动”

羊城晚报:1948-1949年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响应“五一口号”的这一段历程,有何重要意义?

莫岳云:这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今年6月25日发布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也特别提到了它。

1948-1949年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响应“五一口号”、北上参与协商建国,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重要一环,它显现出中共的领导地位日益明朗,各民主党派逐渐明确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合作协商建立新中国。

其实,这种认同和接受领导,也有一个过程,各党的合作关系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直到全民抗战期间,尤其经过1946年“旧政协”召开时与国民党的斗争,其后共同致力于反独裁、反内战,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才更加密切,对民主、革命进程的认识也更加趋于统一。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皮书提到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政党协商有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形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三种形式在建国前夕的这场“新政协运动”中都已在成功实践了。

羊城晚报:民主党派何时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莫岳云:整个“新政协运动”实际就在中共领导下推进的,民主党派在其中的表现,不论是迅速联合表态响应“五一口号”,还是在各种座谈会、发表文章批驳“中间路线”,并且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进程中的首要地位,这些都表达了迫切的团结、合作之意。

特别是到了1949年1月22号,已抵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等55位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其中更是明确提到:“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中指出,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北上共商建国大计、筹建新中国的这个过程,“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概括。

延伸

李济深:北上名单中的“头号人物”



“新政协”开幕前,李济深先生在签到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委会主席。李济深在香港民主党派领袖中最具政治影响力,成为时局的焦点人物,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李济深就热烈响应。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致信邀约,而且在中共中央列出的29人邀请北上名单中,李济深名列首位。周恩来为李济深等人北上制定了极其细致的接待方案,包括租用的轮船、登陆的口岸、居住的旅馆,甚至御寒的衣物等等。

为了动员他早日北上解放区,中共方面和民革的进步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专程上门拜访,不仅资助2万元安家费用,而且表明李济深离港后的家庭生活费用可由中共承担,还将最大限度帮助他们家人团圆。这才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李济深最终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寒彬等民革同仁一同北上。

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形势下,广大在港民主人士读到《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史称“五一口号”)时那种振聋发聩的兴奋之情!

在1948年4月30日晚由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的这篇文章当中,所列第5条为毛泽东主席修改初稿时亲笔重新起草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点睛之笔,“实际上是对世界宣布了中国将出现的姿态”(马叙伦),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进步民主力量协商建国的精彩华章。

5月1日,毛泽东即交代中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他致李济深和沈钧儒两人的函件,以协商的口吻,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具体意见,并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于“本月份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同日,中共中央

作为亲历者,当时在中共领导的香港《华商报》任职的杨奇先生回忆:“从这时起,香港便掀起了一个‘迎接新政协’的热潮。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各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座谈会、报告会一个接着一个,《华商报》上刊登的专论、‘笔谈’也一篇接着一篇。”

确实,从“五一口号”发表之后直到当年7月,上述民主党派均以集体名义发表了声明、告同胞书或宣言等,群起响应,为筹备新政协出谋献策。在当年的《华商报》上,可以一一看到所刊载的那些群情激昂的语句。例如:

6月9日,致公党发表的宣言中说:“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6月14日,民盟发表的告

民主协商

集思广益

风雨同舟

上述会议的记录者是当时香港工委的统战委员罗培元。他后来还回忆,讨论的时候大家畅所欲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都可以提,以最大限度集思广益。而中共香港分局领导方方、潘汉年等人,除了讲解一些北上的交通问题,并未发表自己的见解,“更没有强加于人的做法”。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电复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对其言行表示“极为钦佩”,并进一步邀请他们就民主建国诸事宜,以“卓见见示”。同一天,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等人,命他与香港分局负责人一起完成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任务。

几经筹谋,从1948年9月开始,共有20多批、总人数超过1000名的民主人士和各界精英,在当时陆空交通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乘坐租用的货船陆续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再转赴北平。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



1949年9月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

羊城晚报 晚会 · 文史小语

E-mail:hdjs@ycwb.com

九百年前的“车祸”现场

□沈淦

蔡崇礼,字叔厚,为宋代名臣。《宋史》有传评述他“为人不高傲,能容众,廉俭寡欲,端方亮直,不惮强御”,还说他“除专权辞事外,还调饷音律,常在气振之时,慷慨长歌,议论风生,不愧为一时之英”。

南宋时洪迈创作的文言志怪集《夷坚志》卷十四中,有一则《蔡叔厚》,专门记载了蔡氏的一件趣事。年过不惑才出任为官的蔡崇礼,有一天骑着马出去办事,经过一条街巷的拐弯处时,遇到一位卖药翁。这老翁肩上挑着副装饰华美的药架担子,架上搁着数十只白色瓷罐,内装有药——显然,他是想赶早卖个好价钱呢。马儿遇人慌乱,蔡崇礼忙一拉缰绳,马受惊后长嘶一声,前蹄一蹶,正好撞上了药架,老翁身子一歪,跌倒在地。

这分明是九百年前的一场“车祸”嘛!

“肇事者”蔡崇礼吓坏了,急忙跳下马来,扶起老翁,连声道歉。谢天谢地,老人家倒没摔伤,只不过,架子上的瓷罐几乎摔碎了一半,药也泼洒一地。蔡崇礼再三认错。

哪知老翁是市井中人,得理不饶人的劲儿上来了,他一把揪住蔡崇礼的衣服,不依不饶地数落开了:“你小子长不长眼睛?会不会骑马?你见没见过太师出入,那跟从者、唱呼者,数十上百,前面还有大批士卒、警卫,要么举牌撑旗,要么持戈荷矛,呵斥开道。他们一来,街边坐着的人都要起立,忙着施礼致意,前面的人更是赶快避让……你又见没见过太师出巡?那武士啊、狱卒啊,前呼后传,首尾相衔。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只要不是既聋又瞎的,看到这个阵势,哪个不赶紧奔逃躲避,哪里会有冲撞的可能?可你小子倒

好,独自一个,骑着匹劣马,孤零零、静悄悄地就过来了,叫我老汉如何避让?”

蔡崇礼不傻,很快就看出来了:这老翁是个愤世嫉俗之人,他并不在乎瓷罐、药材这点物质损失,只不过借题发挥,吐一吐胸中的激愤之气罢了,而且还读过些书,语言也不失诙谐。

八九百年前的汴京,可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转眼之间,这“车祸”现场潮水般涌来好多看热闹的人。大家想,今天这位尴尬的官人,撞上这个难缠的老汉,面子可丢大了!

不过,人们未必了解蔡崇礼的身世:他是山东高密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据说10岁时就能为乡邑邻人撰写一般人不敢下笔的墓志铭了,可见聪明绝顶、才气过人。不仅如此,蔡崇礼还词锋机智,善于应对。所

以,处于这一尴尬境地,他倒是镇定得很:当老翁发作时,他默默无言,不动声色;等老翁数落完了,才慢条斯理地开了腔:

“老人家,您责备得很是,我的罪过确实太大了。但我今天受这匹劣马的牵累,也是无可奈何呀。人生的富贵与贫贱自有定数,我何尝不想当大师,何尝不想当大尹!可我才刚刚步入官场,哪敢好高骛远奢望之?您瞧见井子街上的那刘家大药坊没,它有高大的门堂,气势不凡,光是当街的正屋就有七间!所以我就算再骑术不精,也不至于单人匹马地撞入刘家,损坏其药材、器皿吧……”

刘家药坊是当时汴京城里最大的药店,蔡崇礼的潜台词大家都听出来了:他自己固然没能当上宰相、大尹,场面不够,可是卖药翁也远没有开大药坊的同行那

样风光,能让马也退避三舍啊……这番机智的回答,立即博得了围观者们的掌声,还有人大声喝彩。卖药翁顿时泄了气,赶紧松开手,用俗语说:“也罢,也罢。”

于是,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就被蔡崇礼巧妙地化解了。

顺便说两句:不久北宋灭亡,蔡崇礼为南宋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出了不少力;出任地方官时,也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而且他还在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因被离婚而身陷囹圄的时候,为她向奉报宋高宗、请求主持公道,所以李清照还写过一封著名的书信《投翰林学士蔡礼启》,对他表示感谢。

再后来,蔡崇礼因为得罪了权势熏天的奸相秦桧,被迫辞职还家,病逝于浙江台州,享年60岁。